

民主对中国，是咽不下去的毒药。

贫道

这篇文章要说明：

一，民主是绝对的亡国之路！因为民主必然造就独裁，接着，就只能用亡国才能解决问题了。

二，在中国，共匪垮台以后，也绝对搞不起来民主。说形象点：对民主这副毒药，中国人就算是想吃，也咽不下去。

如果直接说最根本的，包括：民主是谁发明的？到底是做什么用的？等等，那么就码不出多少字了。因为越根本的就越言简意赅，但是如果要回过头来把它解释得让普通人都能明白，可要费大劲。所以只好从下面几个方面来个肤浅的介绍，但是也足够让读者们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个认识了。

一，民主政体得以实现的条件。

二，民主政体必亡国。

三，中国与民主水火不容！

四，对中国未来的政体的设计。

民主政体得以实现的条件

一，新制度当然是为了代替旧制度。民主政体代替的如果是君主政体，代替的过程可以分成“演变式”和“换班式”。

“演变式”的典型例子是在英国。

1215年5月17日，由贵族，领主、教士、骑士组成的群体得到伦敦市民支持，占领了伦敦。6月10日，挟持英格兰国王约翰。6月15日，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该文件把王权限制在了法律之下。

1216年10月18日，九岁的亨利三世即位。10月12日，皇室大臣以亨利的名义再发出《大宪章》，但是其中部分条款被删去。

1263年，亨利三世无视《大宪章》。国王同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内部出现纷争，以孟福尔为首的贵族反对派在内战中获胜。他于1265年在威斯敏斯特宫召集会议，出席的除了按照惯例有贵族外，还有骑士代表、市民代表。英国的议会由此出焉。

1297年10月12日，爱德华一世发布最后一次修订的《大宪章》

1688年，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通过《权利法案》。

1701年，《王位继承法》从法律上确认“议会主权”原则，给王权以很大限制。

1721年，下院多数党领袖、内阁首席大臣兼财政大臣沃波尔取代国王乔治一世而成为内阁首脑，成为了事实上的首相，

1937年，《国王大臣法》使内阁的名称和首相的职位有了成文的法律根据。英国的民主制，从理论到技术，算是板上钉钉了。

注意：在“演变式”过程里，

1.君主并没有被赶下台。其对国家的意义，只像个吉祥物。

2.君主的权力是被贵族里面的反对势力一步一步用胁迫的办法夺下的。这些贵族当初是只想夺权，不想消灭君主，因为如果没了君主的庇护，贵族的地位由谁来保护呢？贵族一开始肯定想和平民划清界限，但是，注定的，既然君主没落，胜利的果实最后一定是被平民拿到了。

3.自然地，“演变式”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英国用了超过七百年。

“换班式”的第一个例子是法国第三共和国。

1870年9月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的色当战役中被普鲁士人俘虏。在甘必大领导下，法国于1870年9月4日成立临时国防政府。

1871年1月，法国投降后，临时国防政府解散，并举行了全国选举，目的是建立新政府。结果，主张恢复君主制的占多数，支持国王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伯爵继承法国王位。但是尚博伯爵过于理想主义，认为恢复过来的君主制必须消除革命的一切痕迹，包括最著名的三色旗，以恢复君主制和国家之间的统一。但是人民不愿意放弃三色旗。因此君主主义者只能坐等尚博伯爵死后，把王位交给他的更开明的继承人巴黎伯爵。

1876年的选举显示了公众反君主制。共和主义者占据了众议院多数。这太容易理解了：六年时间过去了，人民总是擅长健忘的，也不愿意再改变现状，更有人在里面已经吃到了甜头。而且毕竟法国历史上就有过两次共和制，人民对这种事不陌生。君主制就再也回不来了。

注意：在“换班式”过程里，

1.如果君主因为外国的入侵，突然消失了。那么“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原来君主以下的重要势力，比如部长，省长，元帅里面，就算个别有篡权或者分裂国家的非分之想，也没有半点成功的机会。那么，他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另立新君。但是，如果这条路不通，就只有一条路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一起掌权。民主政体就这么产生了。

2.反过来，如果君主是被国内的造反搞掉的，造反的英雄“马上得天下”，“黄袍加身”，“改朝换代”。民主自然连影也没有。

第二个例子是德国魏玛共和国。它的民主制度建立的过程更复杂一些。一个原因是德国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历史悠久。1871年德国才由俾斯麦凭着雄才大略和长期的努力，以普鲁士作主体完成了统一。德国没有议会，首相只对皇帝负责。很快威廉二世就把专权的俾斯麦撤职。因为缺少历史经验，皇帝和人民都对国家利益到底何在，还有追求国家利益的努力应该有个限度完全没有认识，所以一直到1918年，办了太多蠢事，欠了太多的旧账。另一个原因是魏玛共和国诞生在动乱里。

如果说，别的国家拥有军队，那么普鲁士该算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陆军在普鲁士和德国里有着过分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战争期间。1918年，当时由兴登堡领导的德国军队要求成立一个文官政府来向协约国求和。新任德国首相马克斯·冯·巴登在10月3日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停火协议。10月28日，德国政府修改宪法，实行议会制。首相以后只对议会负责。

10月29日，威廉港两艘军舰的水手兵变，接着蔓延成了全国性的，有军人和工人加入的大叛乱。叛乱分子在很多城市里夺取了权力，试图模仿俄国的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这其中有共产党的大力煽动。

当时工人阶级分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支持议会制。11月9日，首相巴登将权力交给社民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1月10日社会民主党人，政府总理菲利普·谢德曼宣布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成立。两个小时后，共产分子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宣布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样德国就直接发生了分裂。

艾伯特为了能控制局面，就与军队达成协议：只要军队保护政府，政府就不改革军队。军队接受了，镇压了共产分子，而且宣布不再支持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在11月10日流亡到荷兰。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议会大选。议会代表为了避免受到柏林的暴力事件影响，改在威玛召开国民议会。魏玛共和国由此出焉。

这个例子和前一个差不多，都是在君主突然不存在了以后，有关方面没有别的办法，不能不实行民主制。

二，民主政体代替的如果不是君主政体，是独裁政体。那么，波兰第三共和国是个合适的例子。

对波兰的历史，至少可以从十世纪算起。

1025年，博莱斯瓦夫一世加冕为波兰国王。

1385年，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实行王朝联合。

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成立统一的波兰共和国，史称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第一共和国）

波兰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为“贵族民主制”。这种制度有两根支柱，一个叫自由选王制，国王由贵族选举，不是贵族的就没有民主体力。一个叫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这项议案就不能通过。明显的，自由否决权肯定把所有的国家大事都搞黄了。

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士也在协定上签署。这已经是历史上波兰第三次被瓜分。从此波兰消失长达123年。

1918年末，一战接近尾声，奥匈帝国，德国，俄国已经明显要战败，俄国又爆发了十月叛乱。这给波兰的复国形成条件。

11月18日，毕苏斯基在华沙组成联合政府，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波兰恢复独立。

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巴黎和会上同意重建波兰。

1921年3月，波兰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只是在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极端主义的威胁严重，波兰政府禁止了所有共产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在国内的活动，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速战速决。接着苏联伙同德国又一次瓜分了波兰。1940年春，苏联更将其俘获的2万多名波兰军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杀害。

1944年8月，为了保住华沙不落进苏联口袋里，忠实于正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波兰地下军在华沙起义。苏军在华沙郊外按兵不动，任由德军消灭波兰地下军，然后苏军轻松占领华沙。其后更以政治协商做借口，把十几名忠实于波兰流亡政府的政治人士骗到苏联并且消失掉了。

1947年，波兰举行议会选举，苏联的傀儡成了政府首脑，一个苏联元帅担任了国防部长。苏联在华沙建立了共产独裁政权。

波兰人炽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俄国和苏联的深仇大恨，再加上波兰人传统信奉天主教，又和共产政权对宗教的压制产生了尖锐对抗，还有共产政权造成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共同促使波兰激烈反抗苏联。

对波兰人民最终推翻苏共傀儡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体起了重大作用的是美国。

在1971年召开的，由三十五个国家，包括苏联参加的欧洲安全会议，结出的果实是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它当时不被重视，但是后来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对苏联的一大胜利。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关人权的条款。它要求全体签约国家实施若干列举的基本人权。提案人希望这些条款能创造出一套国际标准，阻止苏联镇压不同政见者和革命人士。随着情势的发展，东欧国家英勇的改革派利用这一条款号召同志们奋斗，促成国家脱离苏联宰制，波兰的瓦文萨也在其中。

1980年10月，团结工会出现，瓦文萨被当选为领导人。

1981年12月13日，团结工会被取缔。

1989年2至4月，波兰执政党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承认团结工会合法。

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99%的参议院席位。

1989年9月12日，以团结工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成立。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出任总统。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更改国家性质，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波兰第三共和国来了。

1990年11月波兰举行大选，瓦文萨当选总统。

这里大费笔墨介绍现代波兰民主政体成立的经过，是因为波兰和将来中共垮台以后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波兰当时实行民主制度的必然性，正好证明了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绝不可行。对这个稍后详加叙述。

民主政体必亡国。

民主的本质是权力的分散和各部分的互相制衡。那么，怎么分散？分散给谁？民主制度唯选票是举！所以坏人夺权，只用争取选票就行。民主制度下的窃国大盗们十分推崇“笔比剑厉害”。

作为例子，法国第三共和国，从1871年到1940年，70年的时间里居然换了140届政府。国家政策总是要待以时日才能见效的。照法国这种搞法，还能有什么长期性的政策实行？国家还能干得成什么大事？

比如，法国在一战里牺牲了一百四十万人之多。巴黎差点沦陷。对这样的处境，法国是绝对不敢再试一回了。所以法国在战后处理好对德国的关系就是最重要的。最正确的办法是两手抓，一方面对德国保持军事上的高压，包括坚决执行对凡尔赛条约里定下的对德国军事的限制，维护莱茵河两岸的非军事区，取消德国总参谋部，对陆军和海军的数量限制，禁止建立空军等等，另外一方面是对德国安抚，显示宽大为怀，以此来减少对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后来希特勒正是凭着过人的政治嗅觉和煽动技术，充分利用了德国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二战以前达到了他的成就顶峰。

从1918年起20年里，那么多位法国总理里肯定有人也想到了上面那个政策，但是没人做到，就连退而求其次的也没做到。其实只要能切实执行对德国军事的遏制，也可以避免二战的爆发。德国的重整军备，逐渐亮出匕首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如果对德国得寸进尺式的扩大征兵，突破限制地建立海军和空军，进占莱茵兰，吞并奥地利，强行割据捷克的苏台德区，吞并捷克，甚至进攻波兰，能有一次出兵干涉，都可以不用费太大力气，甚至不用开一枪就可以胜利，而且必然能激励德国国内的反希特勒势力得手。法国把那些好机会都错过了。

1940年，德国在军事上完全战胜法国以后，赖伐尔（希特勒蔑视地称之为“一个卑鄙的民族主义小政客”。）的一通游说，居然就劝得国民议会自杀，把权力交给贝当元帅，贝当接着宣布成立“法兰西国”，也就是“维希法国”。戴高乐逃到英国，打起“自由法国”的旗号，当时被法国人普遍看作是逃兵。

能证明“民主必然造就独裁！”的更明显的例子是德国魏玛共和国。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失败以后，决定了以后要用合法的手段夺政。直到1933年3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给了希特勒最高权力。关于这期间希特勒是怎么一步一步爬到权力顶峰的，读者们可以去看史料，尤其合

适看《第三帝国的兴衰》，不妨边看边想：如果自己身在当时的德国，对希特勒能有什么合法的办法对付？答案是：完全没有！

身在由民主造就的独裁里，人民就只能等着外国来亡国才能得解放了。而且，更要命的是，接着建立起来的政体只可能仍旧是民主制。这样，这个国家的苦难，就成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如今，近代民主的发源地英国和“灯塔国”美国，无不在大步奔向独裁专制。法国，德国，加拿大…也是一样。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的大选再不能胜，全世界就进入了黑暗时代。

下面再系统性地阐述一下。

1.君主制里，人民承认君权，明君必有“爱民如子”之愿。明君可以让国家兴盛，昏君可以让国家衰败。

2.独裁制里，窃国大盗为保权力不失，必以商鞅五术奴役人民，不顾民不聊生。

3.民主制里，必然造就独裁。对这样产生的独裁政体，就非得用亡国才能消灭了。所谓“君主立宪制”只不过是尚且把君主当摆设的民主制。

其实，如果不把“独裁制”单独列出来也行。对君主和独裁者的区别，一针见血地说，就看他有没有得到人民的承认权力和服从。

如果人民承认君主，自然也就承认符合法统的权力转移。说白了，不管是因为世袭，禅让，还是选举，只要人民承认，新君主就有了合法性。

如果有人用造反推翻了旧君主，得到了人民的承认和拥护，那么他就是新君主了。改朝换代不都是这么来的？反之，他就是人民眼里急需被打倒的独裁者。一个君主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承认，那么他的名声也就蜕变成了独裁者。

对由君主蜕变成独裁者，造反的人要么可以用推行“民主”做大旗，或者直说要再来一回武王伐纣。这两种说辞都能让造反显得有道德。但是在一个已经利用民主制度窃了国的独裁政权治下，造反的人还能找到什么借口说他的造反有道德性？“破坏民主”这条大罪他扛得起吗？谁会支持他？师出无名，必败。

如果说君主制国家有时候会患病，那么独裁国家死得快，民主国家死得慢点而已。

中国与民主水火不容

将来，中共的独裁统治覆灭以后，新政权即使打算实行民主制度，也绝对做不到！原因至少有这些。

一，新政权面临的是空前的内忧外患。如果强行在动乱里的国家推行民主，国必速亡！

新政权的建立，自然应该从消灭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让它再也不能发号施令算起。说得形象点：占领了中南海。但是这离控制住全国差得还太远。毒蛇的头被斩了，可它的身子还没死。

中共自最高层往下，实现对全国的控制的，是一个庞大的党政官吏队伍。还有一部分依附于中共的，分布在商业界，知识界，文化界等等各个方面的机构，它们算是中共的外围。它们对新政权只有发自骨子里的敌对。在发觉北京出现异常以后，第一反应肯定是观望，等待形式明朗化。这绝不是新政权可以“传檄而定”的。等到它们相信新政权确实来了以后，有些在原来中共统治结构里的低层，和中共绑定得不甚紧密的人会试试能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原来紧密依附于中共，已经吃肥了的大员们，会坚决和新政权对抗，意图复辟中共。也有的人虽然不打算冒险，但是要在眼前尽力捞取利益，至于吃下肚的就绝不会再给吐出来。这两种都是对新政权的敌对分子。这样，新政权从建立开始，就像是突然空降到了雷区的正中间，举步维艰。

一般地，争夺政权就是争夺法统地位，目标是做到不再需要动用武力，民众就顺从。越是要打破顽固的旧制度，就越需要赤裸裸的力量。在这方面，新政权可以参考不久以前在孟加拉国发生的事情，民众在旧政权被推翻以后，自发地处决那些旧政权的“勋戚”们。新政府对这种事情袖手旁观，这是个狡猾又有效的做法。等到民众的热情冷却一些以后，政府亲自下场再来一波。这样充分消灭了敌对分子。

还有，早先里说到的那两种敌对分子，一定会干一件事，就是分裂中国。它们的野心，加上当前有些“少数民族”里甚嚣尘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恐怖主义，再加上有些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必定会给予它们支持，给新政权造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将来，最有可能用极端方式企图分裂出去的是新疆，其次是西藏和满洲。

维吾尔族对汉族的仇恨简直是在骨子里的。过去，中国皇帝满足于其他民族自称藩属，平时绝不干涉藩属的“内政”。因为大家平时不见面，

倒也相安无事。但是在中共国，情况一下就复杂了。如果要研究一下：维吾尔族曾经对汉人的暴行，欠下的累累血债，和它们自称的中共在新疆的恶行何为因？何为果？就像是在研究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作者觉得：维吾尔人把中共在新疆的有些措施，作为了掩盖自己天生的恶，和在实行恐怖主义的同时还想骗取外界同情的掩饰。

穆斯林们除了在一个纯粹的伊斯兰教国家里还能安分守己，在别的国家都是祸害。就像癌细胞不互相杀，只杀健康的细胞那样。

“民族自决”绝不是造就和平的办法。日常生活里，对某一个人可以评定道德水平，进而相信他值不值得信赖和支持。但是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就不能用这种思想。因为国家和民族是由很多很多人组成的，圣人和傻瓜总是极少数。在考虑对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应该用什么样的政策的时候，关键也就是预测对方的行为。这时候，必须要从两方面来想：第一是从历史上看其群体思想有什么特征，或者说，根本的欲望在什么地方，可能还要追溯成因。第二是对方的处境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的欲望。在这样的思考里，假设“人性本恶”是最基础的前提。对一个极端民族给予“自决”只会酿成大祸，必须给以有效的制约才行。

最早在世界范围里狂热输出“民主”，“民族自决”的是上个世纪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接着小罗斯福和里根跟上。在不远的将来，历史就会给这些美国的卖国贼，世界的祸害以正确的评价。

要把一个习惯作恶的民族改造得善良，必须多管齐下。一方面，攻心为上，淡化这个民族内的人群对民族特色的印象，包括从教育上抹掉他们的历史，文化。另外，给他们一个不算小的经济生活空间，这样缓和极端主义对他们的诱惑。对已经冒出头来的极端分子，必须不受法律的限制，使用军队，警察，秘密警察坚决消灭，如果能灭九族就更好。

会支持新疆作乱的是伊朗。中亚五国和新疆，地理上连成一片，民族上没区别，特别是都信伊斯兰教。以前俄国限制着伊朗往这里伸手。如果将来俄国衰落，伊朗居然能做到向中亚五国和新疆输出伊斯兰教旨主义，那对中国太危险了。

西藏如果分裂出去，至少由于经济上的不能独立，必然倒向印度。这会其他亚洲各国，直到全世界为之震惊，因为这形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危险。对中国，就像是有人把炮摆在了门口。幸好美国绝不能接受这种事。

西藏如果分裂出去，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破坏了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日本对中国历来是爱恨交织。对一个强大的邻国，更别说还是同种族，自然不能不试图交好。日本恨的是中国不受控制。上个世纪日本对中国的那场战争，深刻地代表了日本民族性里的一面。虽然战后日本顺应现实，

把国家安全委托给了美国，换来了美国的信任和大力扶植，在经济上得以一飞冲天。但是如果美中交恶，日本会掂量有些问题上该站在哪一边。以前美，中，日三国的友好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平衡。现在，日本在经济上的强盛，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欲望，还有对扩充军备蠢蠢欲动。如果中国和俄国都衰落了，那么日美安全体系的前提就完全消失，日本必然全力追求核武器和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大国。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次被刺激得膨胀起来，二战前的那个日本的影子又浮现了。

俄国和日本都不能接受满洲落到对方手里。历史上他们为这块地方打过的仗可不少了。如果满洲分裂出去，它的领导人也不傻，那么他应该把满洲独立，然后争取左右逢源。

除了这三大热点，其他地区也会有豪强像山大王那样搞割据，这样中国就进入了新的春秋战国时代。如果真的这样，那还奢谈什么民主？连民都没有了。

一个新政权身处于这样严重的危险，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时候如果要推行民主？简直是嫌国家死得不够快。历史上有个生动的例子：南越。

二战以前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战后法国又回来了。但是 1945 年共产党分子胡志明开始作乱。这件事情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在美国流行起来一种论调：必须在越南遏制住共产主义的侵略，不然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整个东南亚恐将不保。但是却没人说说为什么不能在安定得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建立防线，却一定要深入越南。

美国开始用财务和后勤帮助法国维持战斗，但是又附加了一个荒唐的条件：法国日后必须让越南独立。但是谁会为了不久以后就要放弃的地盘去流血？1954 年 7 月，日内瓦协议规定以北纬 17 度划分南越和北越，两年里举行大选，所有的外国军队撤除越南老挝柬埔寨，不得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实际上这些只限制了法国和美国军队。）。

用纬度线来隔开一只狼和一只羊，是太糊涂和不负责任。南越可没有马奇诺防线或者柏林墙，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北越分子想进就能进。美国人挑选了吴廷琰主政南越，但是又一定要他推行民主，南越覆灭的祸根从此被种下。

吴廷琰和瓦文萨绝不是同一种人。美国的鼓动人权和推行民主，给瓦文萨铺好了路和预先颁发了奖状。美国先给瓦文萨量身定做了一个角色，再把这个角色越来越做成主角。瓦文萨既然宣称自己是人权战士和民主战士，要是不推行民主，立刻就要被人说成是小人。

吴廷琰早年曾经在法国殖民政府里就职，因为殖民当局不采纳他的献策就辞职。他的政治力量来源于人望和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名声。这种草莽英雄，没掌权以前，一定是在梦里都在想象若有朝一日，壮志得酬以后要如何大展宏图，做个英明神武的开国之君，创下万世不易之基业。要他放弃权力？可能比杀他还让他难受。

对一个能不依靠外国的支援，独立地推翻独裁统治的英雄，他的强大，自然能保证他可以对任何敢说要他交出权力的外部势力轻蔑地回一声“呸！”。

对将来直接推翻中共的那位，自然以前绝没人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他必定是隐忍多时，看准机会才发出制胜的一击。好不容易才大权在握，如何能愿意交出？

回过头来接着说南越。南越地区以前从没出现过政治实体。南越的民主制一开始就碰到了最致命的危险。多元社会的支柱是对基本的社会价值，也就是民众的共同利益有群体思想里的确认，这就隐含了对互相竞争的各种人和各种组织的主张有所限制。或者这么说：在一个安定的，有充分民主传统的社会里，人们能把反对派的声音看作是没打算破坏国家的建设性意见。

但是在一个动乱的社会里，不存在共同利益！表面上的反对派意见，十有八九正是敌人的毒箭。这时候，绝不能让敌人有机会发出声音，急需把它们消灭。

作为对比，波兰第三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内外形势是：外敌苏联正在一步步后退，也再无他国搅扰，国内的前共产独裁政权树倒猢猻散，民族正在趋于单一，宗教信仰早就单一，万众一心，只需要搞好政治体制建设和发展经济，可以算得上是国泰民安。

南越的情况比波兰完全反过来。当时被北越渗透得像筛子一样。北越的目标是阻止南越建立稳定有效的政府机构，而且它们的办法可不只是口诛笔伐，1960年以前，在南越每年有大批的政府人员死于北越游击队的谋杀，其中一部分是最能干的。南越在明，北越在暗。北越占尽上风。吴廷琰面对对国家安全越来越大的危险，不得不更依靠高压手段，却又夹在另一边的美国要他加快民主化的压力下，行动越来越僵硬。最后美国脑子一抽风，居然鼓动吴廷琰手下的军队领导人造反，1963年11月1日，吴廷琰被杀。

军队的造反毁掉了十几年建立出来的国家结构，吴廷琰的后任是一些不懂政治，没人支持的军人们。只在1964年南越政府就更换七次。南越注定不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做到独立自主，成为美国的助力，反倒成了沉

重的负担。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订。美国急不可耐地从越南撤军，虽然明知道北越会撕毁协定。1975年，北越消灭南越。

如果将来中国的新政权落得像南越一样，真是太悲惨，凄凉和不值得。

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主水火不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影响最广的是儒家思想。

儒家有深远的宗教性，深信人道源于天道。和道家一样，儒家相信在天地万物整个宇宙的背后，有一个超越的精神领域与动力，名之为“道”，“上天”为道德之源。天是一种超乎人类的力量，成为道德价值的基础。人性与天有内在关系，人性发展到极致就是天性。天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人会受上天的召唤；天道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培养人道也就实现天道。

儒家思想没有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意义和价值既潜藏于宇宙或大自然，也内在人心之中，上天赋予每个人人性与“明德”，人往内心反省，就能上通于天，了解宇宙潜藏的意义，体会天道，与天同体。这种“天”的信仰，支撑儒家承担天下重任的意识。

儒家思想里，真理是天理，是真实的存在，只有用修行，思考和学习方可得知，不符合真理的就是谬论，知道真理的人是圣人，圣人奉天命而教化民众。民主思想里，把真理看成是大家把冲突调和以后的产物。这二者是何等的水火不容！

三，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的柱石。中国正好没有中产阶级。

在健康的社会里，中产阶级比起富裕阶级和贫民阶级，是人数最多，最主体，最有意愿要国家稳定的。中小企业是一个健康的国家经济的柱石。在反面，富裕阶级和贫民阶级本能地盼望动乱。早先说过了：多元社会的支柱是对基本的社会价值有群体思想。这种群体思想正在中产阶级。

但是由于中共的倒行逆施，中国已经没有了中产阶级，至少可以说，不存在了人格和经济上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中共在建国初期，就用土改消灭了地主，用“工商改造”消灭了资产阶级，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中共大员大多跻身最富有阶级。

早先说过，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坚决肃清敌对分子，其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非此不能把国家经济拨乱反正。因为富有阶级本来植根于中共，是一定要对抗新政权的，贫民阶级如果不能马上得到生活的改善，很快就会对新政权失望。

至于重建中国的中产阶级，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四，中国人的道德已经全面崩溃，法律意识全无。

在一个没有人，只有人形畜生的地方，谈何民主？

五，中国人普遍对民主一无所知。

法国人民在第三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有波兰人民在第三共和国成立以前，早就都有过对民主制度的亲身体验。可是中国人呢？

海外民运里，有些甚至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讲论起政治来，纯粹是儿童一般的幼稚。就算有的没有完全把宣扬民主当做混饭，似乎还有点理想的，说起要推行民主的时候，仍旧像是太监憧憬性生活。

对中国未来的政体的设计

在下面，因为不想被人说是只破坏不建设，所以奉献一些对中国未来的政体的粗略设想。更详细的有待后人完善。

未来的中国必须实行君主制！详细地说，要仿造以前中国的君主政体。君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至于宪法，政党等等，统统不能再出现。

但是可能需要建立一件事。皇帝治国，自然要了解民意，过去地方官对士绅的意见是不能当耳边风的。但是地方官的下情上达未必可靠，未必真切，甚至地方官听到的民意都可能不真。而且所谓民意里，这一伙人和那一伙人的主张，虽然是矛盾，但是是可以兼顾，折中，或者是抓大放小的，对这种事也必须在基层解决。

所以可以实行这种制度，暂且称之为“地方议会”。就是在基层，比如市，县里建立“议会”，议员由本地居民选举。议会对本地的民政有一定的监督和决策权。政府给议员支付薪金。这样，让民意有一个释放的出口，也避免了地方官因为不能深入民间，免不了会犯的一些错误。这种“议会”最高只设置到市一级，也就是比省级低。

对这种“议会”，为了防止有坏人作乱，要有一些不同于对民主制里的议会的做法。

1. 议员要登记一个居住地址，只能在居住地址所在的选区参选。每个任期有时间限制，比如两年。对最长任期也有限制，比如两期。

2. 禁止政党。所有在任议员和候选人只能用自己的名字进行活动。

3. 禁止在任议员和候选人在公共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网络，报纸，书刊发布声明，广告等。

4. 对议员候选人有资格限制：不允许女性，不纳税的，有严重犯罪记录的，未成年男性（比如不满 24 岁的）参选等等。